

社会



周刊

责任编辑：赵昂
新闻热线：(010)84151048
E-mail:zhaolang880318@163.com

靠什么留住科研人员

赵昂

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的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被媒体报道10万年薪难觅地科研人才后，陆续收到一些简历。事实上，难觅人才的不只是“中国天眼”，其它天文观测站，如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的中国射电频谱日像仪，位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也正在或即将面临人才缺口。这些天文观测设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远离城市烟火。

不可否认的是，受制于科研环境的特殊要求，许多天文台远离喧嚣，事实上，类似的科研专业，不止天文专业一家。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科研项目，都位于偏远地区。也就是说，在考虑这些科研人员的薪酬及待遇时，不能忽视工作环境因素。

“中国天眼”开出10万元年薪招聘的人才要求是这样的，“天文学、物理学、计算机硕士以上，并具有良好英语水平，这样的学历和能力层次，在其它城市并不难寻工作。而地处贵州平塘山区的这份工作，还是要24小时三班倒，且驻地工作半月方能回家，最关键的是，没有编制，属于聘用制，这样的情况下，所谓10万元年薪真的多吗？”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4318元，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为107815元。在北京市，2017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国有单位平均工资是187311元，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88898元，即便是在贵州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去年平均工资也接近8万元。也就是说，以当下同行业社会平均工资来看，所谓10万元年薪，真的算不上什么高收入，甚至都不到全国平均值，更别说背后要付出更多辛苦了。不可回避的是，当下科研工作者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已经和几十年前大为不同，其本人及家庭所需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物资，都需要通过市场获得，其家庭的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需求，也并非“单位包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招聘方“只谈情怀不谈馒头”，不仅是对科研人员合理待遇的忽视，也是对对应重大工程的不够负责，毕竟，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才，再好的国之大器，也难以发挥最大效用。

从西部高校科研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再到引起舆论热议的西安某科研机构副主任设计师张小平离职，科研人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科研人员流失，真的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了。在人才双向选择的就业大环境下，仅靠行政指令是拴不住人才的，留住科研人员，需要的不只是与其学历、能力和工作环境相匹配的薪资水平，更需要相应的综合保障体系，以及公正透明的职业发展空间。如果用人单位总是一副“爱来不来”和“爱走不走”的心态，最终受损的不是有能力高飞的个人，而是用人单位本身，以及其所从事的相应事业。

十堰有群发挥余热“文明劝导员”

本报讯(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赵连斗)记者日前在湖北十堰街头看到，一群戴着“文明劝导员”小红帽和红袖章的老年志愿者，在公共场所劝阻不文明行为，这支被称为“夕阳活雷锋”的“文明劝导”小分队，由离退休职工组成，共有80余人，他们活跃在火车站、汽车站、商业广场等公共区域。

他们每天按照上下班时间，肩扛老年志愿者大旗，上街巡宣传文明，如果发现乱扔垃圾、公共场所抽烟、行人闯红灯、不文明饲养宠物等行为时，就会及时劝导制止。遇到老幼病残孕等需要帮助的特殊群体，便主动帮忙带路、引导如厕等。

中建路桥助力一线职工成才

本报讯“今年准备考一级建造师，不用自己买教材，项目部啥书都有。拿到证书，我会获得2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以后每月都有两三千元的持证补贴。”中建路桥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沧州渤海新区科创园项目部一名青年员工说。

据统计，近两年来，中建路桥有100多名青年员工考取了一级建造师、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会计师等职业资格证书；200多名入职5年左右的青年员工走上了项目班子成员或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岗位，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了人才资源。

(焦利英)

西北油田创新成果显著

本报讯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完井测试管理中心工会积极为职工搭建创新平台，激励职工开展创新创造活动，职工通过创新平台，从“要我创新”变为“我要创新”，11年来取得技术创新成果68项，获得国家专利49项，成为了中国石化西北油田技术创新排头兵。

该中心以打造国家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为目标，加强创新工作室软硬件建设，为职工创新创造提供支撑平台，先后出现多名技术创新带头人，其中2个以创新带头人命名的工作室均获得自治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称号。

(李军 刘红新)

在城中村，女性打工者往往是小社会中的沉默者，其声音也往往被忽视

他乡的“厂妹”

编者按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全中国农民工中，女性占比34.4%，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比31.3%，也就是说，有5300多万女性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很多地方，她们被称为“厂妹”。事实上，女性打工者是许多地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在深圳博物馆里，有一幅巨大的“厂妹”集体照片。在工厂周边，打工者云集的城中村里，她们却

往往是城中村这个小社会中的沉默者。在随迁家庭中，她们可能面临生育歧视、家庭暴力、两地分居、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在打工场所，她们的待遇往往不及男工，发声力量不如男工，在居住环境里，城中村能为女工提供的文化娱乐、学习交流和卫生服务的场所少之又少，但安全隐患却更多。《工人日报》记者深入女工社区，记录下这些试图向社会大众讲述自身故事的女工。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实习生 范伟

戏台上，七名女工披着一抹红布徐徐登台，伴随着舞姿，歌声响起，“一个家庭三个家，一个在深圳，一个在老家，还有一个在他乡。不能陪着你成长，不能伴在你身旁，你在家乡思念我，我在深圳牵挂你……”另一幕，女工朱宋将红布叠作襁褓里的女婴，抱着刚生下的女儿，耳边是家人人的责备：“还是要再生一个啊，没儿子就没后。”

戏剧结尾，一群女工演员们在台上拉起手，边跳边唱《我想》，观众被拉上台加入舞蹈，整个剧场回荡着“我想有个家”的大合唱……

这是“绿色蔷薇”戏剧工作坊的七八个女工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剧——《她们说》。该机构戏剧工作坊每年都会导一幕女工主演的戏，让每个女工出演的自己的真实故事。丁丽是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始人，她认为，女工的故事应该由女工来讲述。

“不想变成一台机器”

丁丽14岁那一年，一日放学后她正在舞台上劳作，妈妈突然告诉她，家里没钱供她念书了。2004年，16岁的丁丽加入了南下打工的浪潮，从老家甘肃甘谷来到广东深圳。

刚到深圳，姐姐告诉她，要查暂住证，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厂牌就留不下来。一周之内，丁丽就进了一家文具厂当流水线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作26天。”丁丽依然记得，工作时身后会有一名管理员在计时，通过计算每分钟可以生产多少产品来规定每人一天的产量。若产量不达标，就要义务加班。“义务加班就是免费干活。”

“每天和机器打交道，像机器运作般工作。如果能看看书，和朋友们分享会不会不一样呢？”丁丽常常这样想。一年后，她换到一家电子厂工作，因为那有个图书馆。在电子厂，丁丽利用下班时间看遍了自己想看的书，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平凡的世界》和《简爱》，“我觉得那些书给了我很多力量。”

2006年，丁丽加入了公益机构的文学小组写工厂故事。在公益机构她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们都想做点更有价值的事情，不想变成一台机器、一个零件、一颗螺丝钉。”

丁丽发现，在一个男女共处的空间，男性往往善于发言，而女性由于性格内向或话题敏感，往往很少说话。“如果有一个专属于女性的公共空间可以让女性自由开放地讨论自己的问题，情况是否会不一样呢？”随着女工在身心健康、婚姻家庭、工作权益等问题日益突出，丁丽对这个女性空间的念头越来越热切。

2015年，丁丽创办了一家专门服务基层女性和流动儿童的社工机构——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该服务中心选址在深圳龙岗横岗街道六约社区的一农民房一层。该社区住的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丁丽希望服务中心能给工人一个家的感觉，与工人无距离感。“女工们，孩子们出门就能看到‘绿色蔷薇’，下了班就能过来。”

与丁丽相似，在成为社会工作者之前，24岁的聂婷也有打工经历，不过，作为一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聂婷进厂打工并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想去工厂体验一番。

“曾在社会服务中心实习过，当听工人讲起打工经历，感受时我的体会并不深，想自己去工厂体验。”聂婷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她曾待过三家外资厂，感受最深的是工作强度有多大，而是工作重复性高，枯燥乏味。

“在工厂，与工人们谈家庭、聊婚姻、工作待遇等，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聂婷说，以前自己只是从表面了解到在工厂工作辛苦、赚钱少、条件差，但从打工经历让她更深刻了解工人这一群体，也能更好地服务他们。

“流水线不停地转动”

月光皎洁，坐在家门前的女工们身影被拉长后印在水泥地上，她们手中利索地摆弄着代加工产品，谈起老家的儿女。这是记者从“绿色蔷薇”出来后在巷子看到的一幕。

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坐落在这样一个居住着众多外来打工者的城中村，是不少女工和流动儿童下班放学后的活动场所。服务中心门面上贴满了女工和孩子们手绘的课程表和课表，正上方是一条鲜红的横幅，写着“女工最牛”，装饰稚气而温馨。走进里面，映入眼帘的是两个大书架，摆满了文学、历史、童话故事等书籍。

全心投入服务女工和外来子女的女工曾在知名舞台上为女工发声。“讲起工人现状、问题时，很多时候就用一个个数字、表格呈现，不具象、刻板。”丁丽认为，社会给女工贴了不少标签，如素质低等，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女工，却是发声最少的。于是，“绿色蔷薇”为女工搭了一个舞台——戏剧工作坊，演一幕讲述女工故事的戏。

舞台上，七名女工将红布拉开，当做生产车间的流水线，围坐在流水线上，女工手中的操作动作一遍又一遍重复着。

朱宋转身，面向舞台说：“我13岁来到深圳打工，进了一家磁带厂。上夜班的工作真的很累，有时候站着干活都能睡着。”

“17岁，我进了一家塑胶厂，因为机器运转慢，常常和同事偷偷溜出去逛街。”舞台上，朱宋停下手中的活儿，前顾后看，偷偷往外走……

“两边准时坐满了人，叫它走来叫它停，流过成为心爱的礼物，伴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成长，流水线不停地转动……”摊开的红布两侧，女工们低头工作，唱起了属于她们青春的歌。

七位女人在台上演了这场戏——《她们说》，剧本来自她们的真实经历。“戏剧以个人故事为主题切入，我们不需要被别人演，也不需要演别人，自己的故事就是一场戏。”丁丽说，通过音乐、戏剧等文化形式呈现女工故事，不仅是为了阐释女工这一群体，更是为了让女工学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学会对话沟通。



机器人分拣效率高

11月8日，智能搬运机器人在仓库内进行搬运作业。目前，这套智能机器人拣选系统主要在无锡菜鸟未来园区的仓库投入使用，作业效率是普通仓库的1.5倍，在机器人的帮助下，拣货员的拣货数量提高三倍。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泉港碳九泄漏事故 专家组公布调查报告

(上接第1版)

根据目前的情况，专家组建议，在大面积清除海面泄漏油污后，需要继续组织清除残余残留油污，同时重点对受到污染难以清理的渔排予以更换，防止附着油污释放造成二次污染，并做好受污染渔排的收集处置工作。另外，继续加强事发地周边区域的海水和空气质量跟踪监测分析。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将督促地方政府加快做好上述工作，持续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分析。

鉴于湄洲湾海潮潮差大且退潮流速比涨潮流速大，海水交换能力较强，有利于水体自净，海洋生态环境会得到自然恢复。根据专家建议，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将督促地方政府抓紧开展生态修复，适时开展增殖放流等措施，改善海区渔业资源。

五、空气质量监测结果是否真实？裂解碳九泄漏事故发生后，福建省泉州环境监测中心站严格按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10)的要求，从11月4日起，在泄漏点周边的上西村、峰前村、肖厝村布设3个监测点，并于11月6日起增设厝后四自然村监测对照点开展VOCs(挥发性有机物)应急监测，并严格按照监测技术规范持续开展采样监测，监测数据真实有效。

名校办分校背后，不乏有房地产商支持；能否名副其实，则受到多方掣肘

全城皆名校，质量有多高？

多达七八十所，其中分校名校中，就不乏有诸多知名房地产企业的身影。

有的分校空有名而无实

如此众多的名校分校遍布在城市里，自然让人在眼花缭乱的同时，也充满了众多的困惑。

家住重庆市南岸区的张先生最近就有这样的困惑。他告诉记者，从年初到现在一直在选房，考察了重庆主城多个区域，不管走到哪里，销售人员提及最多的就是名校资源。“销售人员提到的小学、中学都是重庆响当当的名校，也清晰地告知了是分校，但教育资源和本部可以共享。不过，面对这么多的名校分校，反而让我们无从下手，根本辨别不到到底哪所分校实力过硬，哪所分校是挂羊头卖狗肉。”

记者还发现，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困惑被部分人读了名校分校的家长提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长告诉记者，她的孩子如今就读于重庆某所名校分校，但实际上是一所艺术高中，就读的孩子也多是希望以后参加艺术类高校招生考试。这位家长说，当初就读这所学校完全是冲着名校的名号。

“但通过和孩子的聊天获知，这所艺术高中实际上是名校和艺术机构合办的，另外，文化课教育资源也不是完全与名校共享，很多文化课都是年轻老师授课。记者浏览重庆多所知名中小学的网站，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些名校创办的分校就

孩子在艺术类教学上得到长进，未来一旦在艺术类高校招生考试中失利，文化课知识又没能得到很好地传授，那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前程。这位家长叹息着表示，她正在为孩子重新寻找学校，准备为孩子转学。

“一所学校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校，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时’是教育政策、办学方向，‘地利’是社区环境、周边资源，‘人和’则是管理能力、师资水平等等。很显然，现在社会上很多名校分校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更多是挂了名校之名，但无名校之实。”有教育界人士就表示，名校办分校初衷是好的，这样有利于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但在实践当中，这种名校办分校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分校之间也有区别

当然，记者在走访中也获悉，并非提及分校就一概而论“要不得”，怎么选，才是关键。教育界人士谈到，如果只是冲着名校的名号，大多数分校都可以满足这样的诉求，但作为家长和孩子，更愿意选择名校分校，肯定更看重的是能同步享受到名校的一流教育资源，所以，分校的类别就很重要，只有读懂了类别的关键词，才能作出最合理的选择。

“社会上如今最常见的分校普遍是这三种模式：直属、托管、合办、帮扶。”一位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

人士介绍，直属分校最过硬，完全由原直属学校自己创办的分校，本部对分校直接管理。托管分校也比较可靠，这类分校与本部属于同行行政，通过名校托管办学后，薄弱学校将与名校统一管理制度，统一调配老师，统一质量管理，统一考核评价。最需要谨慎选择的是合办分校，它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直属和政府、学校等事业单位合办的分校，另一种是原直属和房地产企业合办的分校。前者性质是原直属学校，要么是原直属直接管理的学校，要么是原直属输出师资和管理与其他学校共同管理，而后者就是如今最受人诟病，很多所谓的分校只是挂了名校的牌子而已。至于帮扶性质的分校，最好是放弃，因为该分校和直属是两所独立的学校，原直属没有参与该校的举办，仅属于帮扶和被帮扶的关系，严格来说都不能算作分校或校区。

教育界人士也强调，社会上的一些老牌分校还是值得选择，它们具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师资稳定，办学经验丰富，教学质量更值得信赖。而很多新建的分校校区，因为实力未经验证，办学效果自然不会太理想。

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相关人士接受采访时称，名校办分校模式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办学效果，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应该看到，优质学校的发展是一个学校文化积累与逐步形成的过程，需要协调好政府与学校、学校与社会、教师与学生、学校与家长等多方面的关系，否则任何一个不协调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学校的发展，甚至成为学校发展的‘掣肘因素’。因此，名校办分校，必须把各种社会因素综合分析、考虑，明确定位，科学发展。”